

· 读书札丛 ·

西夏官刻本五种

聂鸿音

中原的雕版印刷术于公元11世纪末期传入西夏^①，导致了大量西夏雕版印刷书籍的产生。这些书籍曾埋藏地下七百余年，直至20世纪初才陆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出土，绝大多数都已被外国探险队携去。就目前所知，中国各地收藏的西夏雕版印刷品为数很少，且多是寺院刊刻的佛经，世俗著作只有零星的残叶，而代表西夏印刷最高水平的官刻本则是一件也没有。本文介绍俄国圣彼得堡收藏的五种西夏官刻本，目的是为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一点新资料。事实上无论是从文物价值还是从学术价值而言，西夏官刻本均不在两宋监本以下。

据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修订的法典记载，西夏主管刻书的政府机构叫做“刻字司”，属于政府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分的末等。由于它的品级很低，所以司内只设两名首长，叫做“头监”，此外再没有其他管理人员^②。现存西夏文文献中最早提到刻字司的是崇宗正德二年（1132年）义长写的《音同跋》，其中说到这个部门是在崇宗的“祖帝”在位期间所设^③。不过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刻字司似乎并未独立生产出自己的印刷品，当有政府的书籍需要印行时，往往是由刻字司头监负责交给散居在各处的民间刻工分头完成的，所以，这一时期的西夏刻版质量不高，常见的情况是同一部书诸叶面的字体优劣不同，版框大小不等，甚至行格都不一致。直到12世纪80年代，人们才见到署有

刻字司的独立印刷品问世。从书籍版口和卷尾的题名可知，西夏刻字司的头监由“番大学院”（犹“国子监”）的首长兼任，均为番人。刻工的名字如文末所附的“刻工名录”所示，使用的西夏字都是专门音译汉语的字，这使人确信他们是汉族人，进一步说，这些刻工很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从中原流入西夏，后来被政府统一招募进刻字司的。不过随着仁宗皇帝的去世，西夏的政治、经济局面急剧滑坡，国家内忧外患交集，政府已没有能力继续维持对文化出版事业的投入，所以刻字司在桓宗即位以后的12世纪最后几年便被无声无息地取消了。

事实上，刻字司在西夏历史上仅仅活跃了不到十年，这期间流传至今的可以确证为西夏刻字司刻本的书也不过五种。这五种书于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随即与数千种西夏文献一道被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今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993年冬天，我在该研究所亲手翻阅了这批珍贵的书籍，现结合中外学者的有关著述，对西夏刻字司的这五种刻本作一简介，其中叶面和版框高广因经俄方装裱裁切而造成些小的误差，所以仍以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1963年的著录为准^④。

（一）《类林》十卷。唐于立政原撰，西夏佚名译，乾祐十二年（1181年）刻字司刻本。蝴蝶装，25×15.5厘米，版框18.4×12.7厘米，左右双栏。半叶7行，行15至17字不等。白口或小黑口，版口题类林卷次、叶次及刻工姓名，其中数字用汉文。卷三、卷四、卷七有西夏文尾题年款，其中卷四尾题保存完整，可以译作“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全书照片由克平、史金波等刊布^⑤。

（二）《圣立义海》五卷。西夏类书，不著撰人，乾祐十三年（1182年）刻字司复刻本。蝴蝶装，22.7×16厘米，版框18.8×13.2厘米，左右双栏，8行15字，小注双行。白口或小黑口，版

口题西夏文“立”字、卷次及刻工姓名，下有汉文叶次。卷一有尾题，可以译作“乾祐壬寅十三年刻字司重新刻印”。全书影印件由克恰诺夫等刊布^⑥。

(三)《西夏诗集》不分卷。有《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各一部，不著撰人，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年)刻字司刻本。蝴蝶装，25×16.5厘米，版框18.8×13厘米，左右双栏，8行16字。白口或小黑口，版口题西夏文各部诗题及叶次，间有刻工名，字已漫漶残落。诸诗卷尾均有题款，文字略同，《大诗》卷尾题可以译作“乾祐丁巳十六年四月一日，刻字司头监前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大学士味浪文茂，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师傅座主骨勒善源，笔受和尚刘法雨”。全书首尾俱残，原件尚未刊布，现题乃据内容拟出。

(四)《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原撰，西夏佚名译，乾祐年间刻字司刻本。蝴蝶装，25.3×17.2厘米，版框18×12.7厘米，左右双栏，半叶8行，行17至18字不等。白口或小黑口，版口题论语卷次、刻工姓名及叶次，其中数字用汉文，刻工与乾祐十二年刻字司所刻《类林》同。文中“孝”字缺末笔，为避仁宗仁孝名讳。书存不足四卷，照片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刊布^⑦。全书未见款题，现书题及原撰人为吴其昱考出^⑧。

(五)《六韬》三卷。旧题周吕望原撰，西夏佚名译，乾祐年间刻字司刻本。蝴蝶装，页面大者23×16厘米，小者21×17厘米，版框18.5×13.5厘米，左右双栏，7行16字。白口或小黑口，版口题西夏文“六韬上”“六韬中”，下有刻工姓名及汉文叶次，刻工与乾祐十二年刻字司所刻《类林》同。影印件由聂鸿音刊布三叶^⑨，全书未见款题。

此外还有一些书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很像是刻字司所刻，只是由于原书没有保留下题款，所以一时还无法得到确证。

通过把西夏官刻本和两宋刻本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西夏

本的雕版形式全仿宋大字本，如果不是所印的文字不同，人们恐怕很难把西夏本和宋本区别开来。仅就单版形制而言，西夏本简直可以说是宋本的百分之百的翻版。不过就整本书来说，刻字司似乎并未制定严格的版口规范，这使得在多名刻工共刻一书的情况下，刻工可以依个人的喜好把他所负责的诸版雕成白口或小黑口，不但不须和别人统一，甚至自己再刻别的书时还可以换用版口形制。例如本文最后所附“刻工名录”中的第3人(wei co)所刻《类林》诸版为小黑口，所刻《论语全解》诸版则为白口；第5人(xui teng)和第13人(kui xio)所刻《类林》诸版为白口，所刻《论语全解》诸版则为小黑口。这些事实说明为历来版本家所重视的版口形制似不宜用来作为鉴定西夏本的依据。

通过把西夏官刻本和私刻本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官刻本的版框一律是左右双栏，而私刻本则多用四周双栏。官刻本的版口上部都刻有书名或其简称，而私刻本则一般不刻书名及刻工姓名，有的书如《番汉合时掌中珠》另在版口上部雕黑鱼尾。另外受北宋影响，西夏官刻本偶有避仁宗仁孝皇帝名讳的，私刻本则完全不见此类现象。

从所刻书籍的内容上看，我们可以知道西夏刻字司是一个纯粹为政府甚至皇室服务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及时地刻印仁宗皇帝敕编的书籍和国内科举考试的范本。现有的材料表明，西夏刻字司实际上只刻印番文的世俗著作，汉文著作和番文佛经则由民间书铺和佛教寺院负责刻印。御译或御校的佛经不能进入刻字司，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夏政府继承了宋朝的旧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夏刻字司的生产能力极其有限。事实上，科兹洛夫地理考察队发现的那座西夏皇家书库中还出土了一些写本，著名的如《孝经传》、《孟子》、《孟子传》、《新集慈孝传》等等，这些写本多经仔细校改，显然是未及付梓的译稿，估计西夏政府本来打算由刻字司把它们刻印出来，但限于刻字司的人力而未及开雕，所以这些

书稿便一直在书库里搁置下来了。

注：

①高树榆：《宁夏古代刻书与藏书初探》，载《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4、252页。

③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2页。

④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⑤К. В.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年。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

⑧Wu Chi-yu, "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a Leningrad", T'oung Pao, vol. LV, livr. 4~5, 1969.

⑨聂鸿音：《六韬的西夏文译本》，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5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